

[英] 彼得·赖特 著



SPYCATCHER

# 抓间谍的人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抓间谍的人

[英]彼得·赖特 著

梁于华 李维周 路绍芬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P

1988.3.10

311  
0911  
216  
3  
311  
2763

Peter Wright  
SPY CATCHER

Viking Penguin Inc, 1987

根据美国维京企鹅出版公司1987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米小平 今 晨

封面设计：丁 品

抓间谍的人

〔英〕彼得·赖特 著

梁于华 李维周 路绍芬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5.25 字数，335,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03001—150000

ISBN 7-5012-0046-7/D·7 统一书号：3003·1740

定价：3.40元

## 出版说明

本书是英国军事情报五局的高级官员彼得·赖特的回忆录。军事情报五局是英国的一个反间谍机构，原属陆军，后来改为向内务大臣负责。它于1909年成立时称为第五军事情报组织，当时只有一人，即被人称为军情五局之父的弗农·凯尔。此后，军情五局功勋卓著，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举破获德国间谍网，组织机构也日益庞大。战后，它从事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活动。军情五局的机构、人员和活动情况十分秘密，外界极少了解。

赖特1955年进入军情五局，任首席科学家，供职凡20余年，亲自参与并领导过五局的许多重要活动，对五局的内情了如指掌。他在书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军情五局的间谍活动：在外国（苏联 埃及以至法国）驻英使馆安装窃听器；监听苏联国内与其驻英使馆的电讯通信；破译外国密电码；偷拍英共秘密档案；对来访的国家元首进行窃听；跟踪、策反和绑架苏联驻英国外交人员；等等。书中还不惜笔墨，详述军情五局内部的反渗透斗争。在与克格勃的角逐中，军情五局屡遭无端失败。赖特从截获的电讯和苏联叛逃者的交代中推断，军情五局已为克格勃渗透，因而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除内奸活动。清查的矛头最后指向当时军情五局的局长霍利斯。赖特甚至怀疑英国工党政府首相威尔逊是苏联间谍。但是，克格勃的“变节者”及其提供的情报往往真伪难

辨，再加上来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清查仍留下许多无头案。作者在书中还根据亲身经历，以尖刻、幽默的笔调描写了美国情报机构一些重要人物的趣闻轶事。

本书的出版引起一场风波。英国政府竭力加以阻止，声称此书有损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情报机关信誉。它不惜重金，甚至派检察总长亲自出马，在国内外为此打了十几场官司。然而，正值澳大利亚的官司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美国的维京企鹅出版公司抢先一步，买下版权，使本书于今年7月13日首先在美国面世。

本书揭示了军情五局的大量内幕活动和间谍手段，对我国涉外部门、安全部门的各级工作人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作者真实、生动而饶有兴味的精采描述也有助于各界读者认识扑朔迷离的间谍世界。

## 序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最后一天会是何等情景。1976年1月，在英国安全机关——军事情报五局——担任了20多年的高级职务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我最后一次从尤斯顿路地铁站出来，顺着高尔街走去，走向特拉法加广场。只见冬日的阳光普照，和煦宜人。走了50来码，拐了个弯，走进一个未起名字的办公楼群，入口也没有任何标记。一边是一所美术学院，一边是一家医院，这使人很难想象英国反间谍总部就坐落在这里。

入门后有一凹室，是接待处，一名警察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出示了出入证，然后坐上一架装有特别程序控制的电梯，这些电梯是专为把高级官员载上六楼的里层密室而设的。我悄悄地沿着走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隔壁就是局长的套间。

这一带的办公室都十分安静。深深的地下，可以听到地铁车隆隆作响，把乘客送往城市西区。我打开房门，眼前呈现着情报官员这行职业的必要工具——一张写字台，两架电话机，其中一架是安装着防窃听装置的外线电话，另外一边放着一个巨大的绿色保险铁柜，柜门上有一个大号的号码锁。我把上衣挂好，开始机械地整理自己的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的退休官员太多了，他们游来荡去，探取片言只语的消息和流言蜚语。我却宁愿干干净净，与过去一刀两

断。我决定上澳大利亚去养马，开创自己的新生活。

我转动号码锁上的圆盘，拉开沉重的保险柜门。前面是一大堆从档案室借来的档案，盖有“绝密”图章。后面是一排整齐的小组合箱。许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的档案。现在，这些是最后的一批了。情报人员的常规报告，按例行公事传给我看，还有电子计算机工作小组的最新报告，以及临时情报和研究处人员的最新报告。档案既然传来，总需给予答复，我却无可作答。一个年轻官员送来一份俄国外交官的档案请我看。我认识此人吗？并不算真正认识。这是一桩双重间谍案，多年来时起时伏。我对这一案件有何想法呢？实际上并没有。当你刚加入情报部门时，每件案子看上去都各不相同。但是当你离职的时候，所有的案子又好像都是一样的。我小心地在档案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安排秘书把它们送回档案室。

午饭后，我开始整理组合箱，把它们从保险柜后面一个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箱子里放的是关于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机的技术资料，这是50年代我作为五局的第一个科学官员时保留下来的东西。我叫人把这些资料送给技术处。一个小时候，技术处的处长亲自过来感谢我。他完全是一个现代派的政府科学家：整洁、谨慎、经常想办法捞钱。

我说：“这是我保存的一点零星物品，我想它们对你也不会有多大用处，现在都是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他回答说：“啊，不，我想这些资料会使我感兴趣的。”看上去，他有点尴尬。我们两个人关系从来不好，双方有着不同的背景。我是战争年代临时拉来凑数的，无非是个“万金油”官员，他却是军用品承包商出身。我们握手道别，我继续整理保险柜。

其余的几只箱子存放着我1964年加入反间谍部门以后收集的各种文件，当时对暗藏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搜捕正处于最炽热的时候。这些手写稿和打字的备忘录无非是有关间谍案的那些例行内容——嫌疑人物名单、被指控的细节、背叛、判决等。这种无休止的搜索追逐，开始时倒是目标明确，但结果却往往仍是不解之谜。正是这种搜索和追逐主导着我的历程。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交给我两本蓝皮本子。她说：“这是您的日记。”我们一起把这些日记撕碎，塞进我写字台旁那个用于焚化的废纸袋，等最后焚毁。

我一路走去，来到机要办公室。值班官员递给我一份档案，里面装着一张我现有的机密许可清单。我开始在一张张小收条上签字了结，先签的是讯号情报和卫星情报的阅读权，然后逐项了结我手里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批准件。获悉机密纯粹是个人的事，失去这种权利却是令人痛苦的官僚制度的结果。每写一笔，通向机密的大门就关上一道缝，半小时内，伴随我多年的机密世界的大门从此永远关闭。

时近黄昏，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驶往梅费尔区的莱肯菲尔德大楼，五局的旧总部曾设在那里。当时总部正搬家，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楼，但职员酒吧间“猪和眼睛俱乐部”仍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内，我的告别招待会将在那里举行。

我走进这幢旧建筑。这里走廊的两壁镶着柚木板，办公室墙上有檐口。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和布伦特等人的调查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里也是我们军情五局进行历史上最秘密的战役的地方，那是因为怀疑有一只鼯鼠<sup>①</sup>暗藏在

---

<sup>①</sup> 指打入内部的特工人员。——译者



英国安全部门的“心脏”，未被发现。我们怀疑的人是五局前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能够证实这一点。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一指控耿耿于怀，愤恨不已。双方争斗十年之久，如同中世纪的神学家，为本能、激情和偏见所驱使。

这些主人公一个个都在70年代退休了，最后直到迁往新办公楼的那天，才标志着这场战斗的结束。然而此刻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里闲步之际，我仿佛仍能感觉到变节和追捕的情景，有声有色，并闻到杀人的血腥味。

我的告别招待会简单安静，毫不喧哗。人们说了些悦耳的话，局长迈克尔·汉利爵士作了一个娓娓动听的发言。我还得到一张张传统的卡片，上有人亲笔题赠的告别词句。五局功勋卓著的反特专家克兰莫里斯勋爵写道，我的离职是“一个令人非常悲痛、无可弥补的损失”。他的意思是五局遭到了损失。但是真正受到损失的是我。

当夜我睡在高尔街办公楼顶层的公寓里，偶尔被到达尤斯顿站地铁车的闹声吵醒。第二天一清早，我穿好衣服，提起第一次空空如也的公文包，下楼走到大门口。我向警察道别，出门走到街上。我毕生的事业结束了，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悲痛、无可弥补的损失。

## 第一章

所有这一切始于1949年，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当时我在埃塞克斯郡大巴达城马科尼公司附属的一所实验室工作，是海军的一名科学家。实验室是用预制材料建造的，雨水打在铁皮屋顶上，叮咚作响。一台示波器在我面前悸动着，令人头疼如裂。一大堆潦草涂写的计算结果，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搁板桌上。要设计出一种能够从无边无际的惊涛骇浪中发现潜水艇潜望镜的雷达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为此作了多年的努力。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我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那时是马科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他说：“弗雷迪·布伦德里特想见我们。”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任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现任国防部首席科学家。他近来对我这项设计的进程很感兴趣。需要很快作出决定，看是否应为制造一台原型系统提供资金。费用将是昂贵的，而战后国防研究总是处在同财政紧缩的无休止的斗争中。我作好准备，迎接另一次大发脾气的争吵。

有机会和布伦德里特直接谈话，这是令我高兴的。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战争期间，我父亲和我自己都曾在海军部研究所在他手下工作。我想，这次也许有机会得到一份新的工作。

第二天，我们在绵绵不断的濛濛细雨中驾车驶往伦敦，

到达后把车停在斯托里氏门布伦德里特的办公室附近。白厅看上去灰暗无光，疲劳乏力；那些柱廊和塑像似乎与迅速变化中的世界也很不协调。克莱门蒂·艾德礼<sup>①</sup>还在那里许诺，要给人民“牙齿和眼镜”<sup>②</sup>。但刚刚过去的冬天气候恶劣，人民在配给制度下已经越来越不满了。1945年胜利的狂欢早已让位于充满愠怒的不满。

布伦德里特的外屋坐着一位干净利落的秘书，我们向他作了自我介绍。白厅这一带向来安谧，但这座扩建的楼房里却显得颇有生气。我发现有人比我们先到，赶忙向几位熟人打招呼，他们都是来自几所军用实验室的科学家。我暗自思忖，大概是一次大规模的例行会议。有两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时正从人群中走过来。

两人中较矮的一位唐突地说：“你们一定是赖特父子吧。”他讲话简洁，象是一位军人。“我是国防部的马尔科姆·卡明上校，这位是我的同事休·温特伯恩。”又走过来一位陌生人。“这是我们在外交部的一位朋友约翰·亨利。”卡明使用的是奇怪的暗语，白厅用这种办法来区别它的秘密机关工作人员。我想，不管这次会议讨论什么，总不会是关于反潜战吧；至少不会在有军情五局和六局的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种事。这时，布伦德里特在他办公室的门口出现了，邀请我们进去。

他的办公室很大，如同他的名气一样。硕大无比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的写字台相形之下显得很小。他带领我们到会议桌旁坐下，桌上井井有条，摆着吸墨水纸和盛

---

① 当时的英国首相。——译者

② 指免费镶牙和配眼镜。——译者

水的细颈玻璃瓶。布伦德里特短小精干，和林德曼·蒂泽德和科克罗夫特等人一样，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人材，为满足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科学技术需要做出过贡献。他起先担任海军部科学研究司助理司长，后来又担任皇家海军科学局副局长，主要负责在战时招募科学家进政府机关服务。他作为一位科学家，并不具有特殊的天才，但他懂得科学家能够起重要作用。他的政策是尽量提拔青年，而由于军事首脑们信任他，他能得到必要的物力，让这些青年充分发挥所长。

40年代后期，英国疲惫不堪，国力衰落，却要勒紧裤带，准备新的战斗——冷战。这时聘请布伦德里特来当顾问，再次为鼓舞科学界效力而出谋划策，这显然是明智的选择。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副科学顾问，并接替约翰·科克罗夫特爵士，于1954年升任科学顾问及国防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

我们坐下后，布伦德里特开始讲话。他说：“先生们，我想对我们大家来说，情况很清楚，我们现已处在战争之中，而且自去年柏林事件以来就一直处在战争之中。”

布伦德里特解释说，俄国人封锁柏林以及西方随后采取的空运，对国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继续说：“这场战争要用间谍而不是士兵去打，至少就短期来说是这样。我和安全局局长珀西·西利托爵士讨论过我们的处境。”他最后说：“坦率地讲，形势不好。”

布伦德里特扼要地介绍了情况。要成功地派遣谍报人员到铁幕背后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苏联及其盟国的意图，严重缺乏情报。为了弥补缺陷，需要在技术和科学上作出发明创造。

他说：“我和在座的一些人提纲挈领地讨论过这件事，包括安全局的卡明上校和军情六局的彼得·狄克逊。我成立本委员会来斟酌各种选择方案，立即开始工作。我还建议珀西爵士任用一位青年科学家协助研究工作。我打算提名彼得·赖特出任这个职务，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认识他。目前他属于军用电子研究实验室，他仍将腾出一部分时间到那边去，等我们弄清楚需要做多少工作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说：“彼得，你会为我们做这件事的，对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说：“吉姆，我们显然需要马科尼公司帮助，所以我也吸收了您参加本委员会。”（海军里面的人总是叫父亲“吉姆”，因为从前马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办事方法，发邀请的时候好象是下达命令，而且为了贯彻自己的一套，竟然可以开动白厅机器，使它大为走样。

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们进行了讨论。军情五局和六局的人一言不发，令人注目。我猜想，也许是因为有外人在场，所以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本能地保持缄默。科学家们则一一发言，即席讲述他们的实验室里可能应用于情报工作的研究项目。当然，要从技术上全面审议情报部门的需要，得花不少时间，但他们显然迫切需要新的窃听技术，那种不必放进建筑物就能窃听的设备。苏联的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密，要想进入他们的建筑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打通隔壁建筑物的共用墙，或者是利用重建使馆馆舍的机会。到喝茶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取得研究成果的领域提了20条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文件，对这些建议作出估价，然后就散会了。

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来自我介绍。他在邮政局的技术处工作，会上曾就邮政局在窃听设备方面的工作做了相当长的发言。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说：“我们将在这件事上一起工作，下星期我和你联系。”

在开车回大巴达城时，父亲和我兴奋地讨论了会议情况。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令人不胜荣幸。战争时期，白厅常是如此，但战后却很少见。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有机会逃避反潜艇工作；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此事继续保持了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我家一脉相承，与这一行的联系已有45年之久了。

## 第二章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1912年加入马科尼公司。起初是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截听无线电讯号的方法。他和朗德上尉一起，成功地研制出一种真空接收机，第一次使截听长途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正在切姆斯福德城霍尔街的老马科尼实验室使用这种接收机，忽然发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讯号。他把收听到的第一批讯号交给马科尼公司经理安德鲁·格雷，此人是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霍尔海军上校的私人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霍尔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显赫人物。他负责在著名的海军部40号房间破译德国密码。他安排我父亲坐在一辆专门包租的火车头的踏脚板上，前往利物浦街车站。看过讯号资料后，他坚持要马科尼公司放父亲，去为海军建造截听和寻找方位的站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出海时间，以便帮助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道，德国舰队没有行动的时候，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认为，当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驶入北海时，有可能截听到旗舰上的德国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开始工作，设计充分敏感的设备，最后终于研制成

“非周期性”方位探测器。它可以从一大堆干扰讯号中准确识别需要的讯号的方位。这台设备真正付诸使用花了若干年，但最后在反德国U型潜艇的战斗中成为一件重要武器。甚至到今天，所有寻找讯号方位的设备都是“非周期性”的。

1915年，当这套系统尚未完全付诸使用时，父亲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今挪威的奥斯陆）寻找一处地方设立方位探测站。当时挪威是中立国，但又不能利用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亲自去一趟，为军情六局秘密指挥这座站台。几天后，父亲动身去挪威，假扮成一个经营农药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街道上的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租了一间阁楼，好有足够的高度来不惹人注意地架起探测方位的无线电。

大使馆的军情六局站供应父亲通讯器材和零件，但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他携带的无线电设备最后注定要使他暴露。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他的身份暴露，使馆会否认与他的关系。运气好，他将过一种囚徒般的生活，直到战争结束；运气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风险不小。

截听活动顺利进行了六个月，向海军提供了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价值连城。后来，一天早上，他下楼吃早点，坐在平时坐惯的桌子旁。无意之中，看到街对面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新招贴，上面有他的相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截听活动开始前，父亲已经和军情六局商量好出事时逃跑的路线。因此，他赶忙吃完早点，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放进箱子，然后把它推到床下。他放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了一大笔钱，希望旅



馆老板会因此不事声张。

父亲没有走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挪威当局猜想他很可能走这条路逃跑。相反，他朝西南方向走。顺着海岸走了十英里后，他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休息。过了一会，一名英国海军少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少尉就把他带到一个停泊处，坐小艇登上一艘正在那里等待的英国驱逐舰。

若干年后，当我准备退休时，我试图从军情六局的档案中去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找了当时的军情六局局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花了一天功夫在他们的档案室里寻找这些材料。但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多年前，六局的清查人员早已按常例把这些记录全部销毁了。

我1916年出生在祖母家，她那时在切斯特菲尔德有一幢房屋。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局工作时，母亲就在祖母那里住。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船轰炸了邻近的舍菲尔德，因此我过早出世了。由于战争的压力，医院没有空床位，但是母亲临时用一些装化学物品的玻璃瓶和热水瓶做了一个简陋的早产婴儿保育箱，使我活了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加入马科尼公司。他成为马科尼的宠儿，被任命为研究部主任。我们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但只有几个月，我们便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去了。这所房子象一座被弃置不用的无线电工厂，每个角落都能找出失修程度不同的无线电设备，以及装满线路的铁盒。父亲为人热情，脾气暴躁，容易冲动，与其说象一位工程师，不如说象一位艺术家。从我记事之年起，他就时常带我上花园，或者上埃塞克斯郡海滨上面的开阔原野，给我讲解无线电的秘密。他一连几个小时讲